

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

——以日本地区学界对缅甸研究为例

侯晓雨

摘要：日本现代意义上的地区研究兴起于明治维新至二战时期，主要服务于殖民扩张，战后逐渐制度化，冷战初期转向地缘战略分析，并在冷战中后期开始以跨学科研究和长期跟踪调查为主要研究主法，21 世纪以后结合数字化技术与批判理论，研究的方法与领域更为复杂。具体到缅甸研究领域，不同时期的日本学者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出发，整理了各时期缅甸研究的核心议题和目标任务，始终与日本的国家战略深度绑定，呈现鲜明的工具性与阶段性特征。二战时期，日本学者联合军方通过军事地理测绘、历史叙事重构及语言文化驯化，服务于资源掠夺与军事占领。冷战初期，日本学者通过“民主化经验交流”输出其价值观，同时以“技术中立”为包装进行基建援助，控制并维系日缅经济依附关系。冷战中后期，日本的缅甸研究逐步向具有较高学术独立性和国际影响力的学科体系转向，研究方法以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融合方法为主，研究内容涵盖了缅甸的社会结构、政治环境等多个关键领域。冷战结束后，日本学界开始以更为宏观的视角研究缅甸，研究缅甸的日本学术机构也更为多样化，这些机构和企业合作，利用众多合作项目和实践经验积累了大量数据，这些成果成为日本制定缅甸政策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日本的地区研究；日本的缅甸研究；理论视角；方法论路径；学术贡献

收稿日期：2024—11—11

作者简介：侯晓雨（1994—），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日本和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关系。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区域国别研究已成为各国理解世界、制定政策的关键工具。被称为“亚洲最后一块未开发之地”的缅甸，在日本学者的描绘中是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建立新生产基地的重要选择，拥有廉价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丰富，还可利用以东南亚为中心的日益增长的消费市场以及享受关税减免等优厚待遇。^①

日本对缅甸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同时又覆盖了多个领域，这是由日本在明治时期颁布的“大陆政策”和缅甸的地缘战略价值所决定的。由于日本地理位置偏僻，资源匮乏，在殖民时期其他西方国家进行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为了不落后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积极谋求海外领土扩张和掠夺战略资源。地处亚洲重要地理位置的缅甸自然而然地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同时进入日本学界的研究视野。日本学者对缅甸的研究最早开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明治时代，以1890年小室三吉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代表。小室三吉在三井物产财团资助下前往缅甸进行国家资源状况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撰写了《缅甸纪行一斑》一书。当时被称为“官方学者”的福岛安正于1896年对缅甸进行了考察，并以传统的记录方式将缅甸近代的人口、资源、气象和地理等信息汇成《福岛安正日记》，以此来回馈当时的政府和军方的资助。该书为之后日本的亚洲战略布局提供了缅甸国情概况。这一时期，日本的矿产资源类学术期刊逐步开始发表深入分析缅甸的自然资源方面的文章，比如《日本矿业会刊》和《日本工学会刊》重点刊登了缅甸矿产资源在日本工业化进程中能够发挥的潜力和贡献方面的文章。同一时期，有关缅甸的地理分析多次出现在日本的地理类期刊《万国地志略名称谓》、中小学教育课本《高等小学读本字解》和《中等地理教科书》中，日本的学校将“缅甸”作为地理与历史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拓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深化了他们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

然而，近代缅甸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基本处于英帝国的控制之下，并且日本与缅甸没有直接的外交关系，想要进一步对缅甸开展深入研究相对困难，日本大部分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只能通过文献资料对缅甸进行初步“了解”，这远不及日本对中国或对朝鲜等国的研究深入。尽管如此，随着日本在亚洲的崛起，以及1902年《日英协约》

^① Lindsay Black, *Disciplining Democracies: Human Insecurity in Japan-Myanmar Relations*, Bristol: Imprint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July 27, 2023, p. 85.

的签订，日本与缅甸开始间接发展双边关系，日本对缅甸在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矿产与自然资源的价值有了初步认识。直到二战之前，日本地区学界对缅甸的研究都主要集中于缅甸的资源分布和经济潜力，而对缅甸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民族特征的探讨则较为匮乏。虽然这些“战前研究”为日本研究缅甸提供了基础，但系统性的缅甸学术研究还没有形成，大多只是停留在对缅甸的实用性描述层面，因此该时期的研究并不属于真正的缅甸研究范畴。^①

日本对东南亚特别是缅甸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大规模的日本地区研究则在二战以后。二战时期，日本学者的缅甸研究主要集中于缅甸的战略地位和战争对缅甸造成的影响，研究的主要议题是缅甸的自然地理、战时资源开发和人口资源利用等方面，以服务军事行动和对占领地区的管理为目标。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日本的缅甸研究以战略和政治目的为主，研究有限且集中在对缅甸的控制方面。

冷战初期是日本对缅甸研究的第二阶段。随着1948年缅甸的独立，日本学者根据国家的“赔偿政策”开始分析缅甸在冷战背景下的外交立场和国家走向，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缅甸的经济发展、周边外交和日缅关系，特别是缅甸“独立、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冷战时期日本学界对缅甸的研究从之前的单一范式转为新的理论框架和跨学科研究，为日本政府制定对缅甸更为完善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21世纪伊始，日本对缅甸的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新世纪”的日本学界相较于前两个阶段对缅甸的研究使用了更为丰富的分析方法，更多关注缅甸的军政关系、民主化进程和民族冲突，重点分析了缅甸政治体制变化、选举制度建立及其社会影响。

① 参见：小室三吉：『緬甸紀行一斑』、東京：三井物産、1890年、第4—78頁；福島安正：『福島安正日記 明治二十九年二月起 亞欧跋涉日記 二 緬甸之部』、東京：福島安正、1896年2月—4月、第3—70頁；静間密：『万国地誌略名称訓』、山口町（山口県）：坂田購文堂、1879年、第5頁；工学会：『工学会誌』、東京：工学会、1898年3月、第45頁；国光社『高等小学読本字解』、1900年11月、第76頁；松島剛：『中学東洋歴史』、東京：春陽堂、1897年3月、第13頁；神保小虎：『新編地文教科書』、東京：金港堂、1897年、第41頁；資源・素材学会：『日本鉱業会誌』、東京：資源・素材学会、1897年3月、第2頁；志賀重昂：『内外地理学講義』、浜松：谷島書店、第18—20頁；下村三四吉：『中学東洋小史』、東京：目黒書房、1899年、第117頁；野口保興：『普通地理教科書：中等教育外国之部上』、東京：目黒書店、1900年、第84—85頁；志賀重昂：『地理学（東京専門学校文学科第四回第一部講義録）』、東京：東京専門学校、1901年、第115頁；滝本鑑三：『中等地理教科書』、東京：普及舎、1902年、第54—57頁；地理教授研究会：『中等新地理教科書』、東京：吉川弘文館、1904年、第67頁。

由此看来，日本的地区学界对缅甸的研究成果丰富、范围广泛，但鉴于研究的广度以及较长的时间跨度，本文无法对日本缅甸研究的所有成果进行详尽的探讨，仅以日本政府的官方档案及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不同时期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生成机制、方法论演进、知识权力批判以及对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启示四个方面，对日本地区学界的缅甸研究进行分析。

一、二战时期日本地区学界对缅甸的研究： 殖民知识生产、权力叙事与学科伦理批判

作为“大东亚战争”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时期日本对缅甸的所谓“学术研究”本质上是殖民权力的知识投射。日本在1942年占领缅甸全境后，外务省设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陆军省成立“缅甸相关研究机构”，这些冠以学术之名的机构编纂了《缅甸要览》《缅甸社会经济》等“调查报告”。这种以军事占领为前提的“学术活动”，暴露出知识生产与殖民权力的共生关系——研究者佩戴军刀进行田野调查，学术报告成为军政决策的注脚，所谓的“缅甸文化研究”不过是论证殖民统治合法性的修辞工具。这种畸形的学术伦理，使得区域国别研究彻底沦为帝国扩张的“文化刺刀”。

（一）学科生成机制：殖民与扩张带来的暴力统治

二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发动了侵略战争，此举无疑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东南亚深陷战争的困境，作为侵略者的日本非但没有对这些受害国进行良好治理，反而在占领地大肆宣扬“大东亚共荣圈”主义，并为了满足军事扩张和统治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需要，迫使日本学界将缅甸作为区域研究的重点，把研究当作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的工具。因此，日本学界在二战时期的研究活动，不仅是对战争时期国家政策

的响应，也是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学术使命的独特理解和实践。

1. 地缘战略需要和知识实用化的双重逻辑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军事占领和殖民扩张，缅甸以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和充足的战略资源，成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此时，日本试图通过战争控制缅甸并切断其与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联系，并最终确保对东南亚战略资源的掌控。在此背景下，日本学界开始将缅甸纳入其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范畴。最终，因为日本的直接军事占领带来的直接接触，日本的众多“官方”学者得以深入缅甸并考察当地的社会结构、经济动态及抵抗运动。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普遍受到国家政策的导向，因此研究议题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二战期间日本对缅甸的研究，不仅为战时政策提供了学术支持，也为战后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陆军省主计课别班通过分析缅甸的地理区位，系统勘测了丹那沙林山脉的军事通道，将其标注为“帝国生命线”，为日军“闪电战”提供了战术蓝图；^①大东亚省总务局则通过梳理缅甸民族独立运动史纲，将昂山领导的“三十志士”运动扭曲为“反英亲日”叙事，掩盖了日本扶植傀儡政权的实质。^②这种历史重构不仅服务于军事占领的合法性建构，更试图消解缅甸本土的民族主义抵抗意识。兴亚院政务部的《缅甸事情纲要》将缅甸民族独立运动重构为“反西方殖民主义”叙事，为日本“解放者”身份提供合法性背书。^③

2. “军—政—学—商”的知识生产网络

二战时期，日本通过“国策—学术”耦合的知识生产网络，由国家机构（如大东亚省、满铁调查部）主导战略性研究，形成“政策需求→知识供给→行动验证”的闭环。

首先，实证研究由军方主导，比如满铁调查部通过分析缅甸稻米产能模型，量化缅甸稻米年产量与可征用量，直接导致 1943 年缅甸

① 陸軍省主計課別班：『經濟的抗戰要素としての印度及緬甸抗戰判斷資料第 2 號（其 4）緬甸篇』、東京：陸軍省主計課別班、1941 年、第 6 頁。

② 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緬甸事情綱要』、東京：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1943 年、第 127 頁。

③ 興亞院政務部：『最近的緬甸事情』、東京：興亞院政務部、1939 年、第 2 頁。

大饥荒；^①其次，财阀与学术机构密切协作，比如三井矿山财阀资助印东善二团队绘制了《缅甸矿产资源分布图》，将掸邦高原锡矿、若开海岸石油标注为“战略优先级”，为“以战养战”提供了数据支撑；^②再次，官僚系统参与知识整合，比如外务省情报部根据《缅甸统治法的沿革与政治运动》提出“合作社+土地登记”模式，通过土地所有权集中化提高了殖民治理效率。^③

（二）方法论构建：殖民实用主义的技术工具箱

二战时期，日本对缅甸的区域国别研究，其方法论构建完全服务于殖民扩张的实用主义目标。通过多学科工具的系统性整合，日本地区学界将学术研究异化为军事占领与资源掠夺的技术模块，形成了一套高度工具化的“殖民知识工具箱”。这一方法论体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以军事地理学与空间征服技术将缅甸纳入“大东亚共荣圈”

陆军省主计课航空队对伊洛瓦底江流域实施高精度航拍，结合地面部队的“闪电战”推进路线，生成《缅甸战略交通枢纽地图集》，^④为日本快速占领缅甸提供了直观指引。与此同时，商工省贸易局制定“日—缅—印三角贸易指数”，将缅甸在区域贸易体系中的定位描述为橡胶、柚木的“初级产品中转站”，通过数据模型的推算，合理化资源掠夺，使缅甸彻底沦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附庸。^⑤

① 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世界情势調査委員会：『我カ南進政策ヲ繞ル緬甸ノ政治経済動向』、大連：満鉄調査部、1941年、第2頁。

② 印東善二：『ビルマ及泰の鑛業』、『日本鑛業會誌』、1942年7月、第32—34頁。

③ 外務省情報部：『ビルマ統治法の沿革と政治運動』、東京：外務省情報部、1937年、第508—512頁。

④ 陸軍省主計課別班：『経済的抗戦要素としての印度及緬甸抗戦判断資料第2號（其4）緬甸篇』、東京：陸軍省主計課別班、1941年、第7頁。

⑤ 商工省貿易局：『ビルマ對日貿易』、東京：商工省貿易局、1932年、第2頁。

2. 以历史重构与文化驯化学术宣扬殖民扩张的合法性

日军占领缅甸期间，不仅大肆掠夺缅甸物产，还在历史文化和语言教学方面强化行政控制，通过普及日语教育消解缅甸的文化认同。比如冈村武雄校注的《缅甸史》有意删减英国殖民时期的铁路建设记载，刻意强调“英缅战争”对于缅甸的消极影响。^①日本殖民时期还将语言教育作为一种统治的武器，比如木村荣一郎等人编纂的《军用缅甸语速成手册》，重点强调“征粮指令”“劳工管理”等词汇，将语言培训转化为殖民管控工具，毕业生直接充当日军“军政顾问”，负责基层征粮与情报监听。福岛弘编撰的《缅甸语会话要领》，大篇幅内容是占领时期的“宣抚用语”，日军使用“宣抚用语”拉拢缅甸的民族主义者，试图建立亲日政权，以此扩大自己在缅甸的政治影响力。^②日军占领时期，缅甸防卫军按照日本步兵操典进行训练，其干部被送往日本的预科士官学校接受专业军事教育，同时要求士兵学习日语，要求他们必须背诵军人敕谕和战阵训，以培养他们的军事素养和对日本军事文化的认同感。^③

3. 以科学研究和话语权建构掩盖殖民暴力与霸权统治

二战期间，日本地区学界在缅甸开展的地理学、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均沦为分化与统治的工具，学术研究不再是知识探索，而是殖民机器的精密齿轮——测绘数据服务于军事占领、贸易指数合理化经济掠夺、民族志沦为分化策略、语言教育异化为管控技术。这种“殖民知识生产”不仅为即时战争服务，更通过叙事重构为日本战后在东南亚的隐性霸权预留话语空间，成为区域国别学科史上值得警惕的伦理反面教材。

中岛健一在对“缅甸的自然和民族”的研究过程中，分析了约

① アーサー・フェーヤー著、岡村武雄訳：『ビルマ史』、東京：博文館、1943 年、第 320—357 頁。

② 福島弘：『ビルマ会話要訣：日本語 - ビルマ語 - 英語』、東京：外語學院出版部、1942 年版，第 256—268 頁。

③ Myooo: 「植民地下ビルマにおける国民形成：ビルマ語の成立および歴史・公民教育の普及の観点から」、一橋大学、2006 年、第 75 頁；ビルマ語専攻 | 外国語学部 | 大阪大学；ビルマ語専攻は、昭和 20 年 (1945 年) 4 月に日本で初めてのビルマ語の教育機関として大阪外事専門学校に設立されました、https://sfs.osaka-u.ac.jp/about_fs/edu_fl_bur.html；木村栄一郎：『軍政期の教育制度と日本語教育』、東京：早大社会科学研究所編、1972 年、第 318 頁。

200 万人口的克钦族在殖民土地政策下被迫迁入分散的山地聚集区，各部族之间因地理隔绝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这种状态为日本政治力量的介入创造了条件。^① 国分正三在对“缅甸的克伦族和巴东族研究”过程中，通过田野调查夸大了克伦族内部基督教与佛教的派系矛盾，为日本“分而治之”策略提供了“学术依据”，^② 掩盖其挑拨民族对立的实质。而“文明同源论”则是借助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建构过程实施同化策略。外务省调查部在“缅甸的统治机构”中宣称两者“同属东方精神体系”，为日军“解放缅甸”提供宗教合法性。该理论被直接植入《东南亚战地宣传手册》，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核心话语，将侵略包装为“反西方殖民的文明使命”。^③

（三）知识权力批判：殖民暴力的学术共谋与记忆重构

在日本对缅甸的殖民统治过程中，其掠夺行为不仅体现在直接的资源攫取上，更深刻地体现在知识与权力的层面。日本通过所谓的“战时学术研究”和数据统计，将缅甸的资源 and 人民置于其管控之下，这种控制不仅破坏了缅甸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在知识和记忆的层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1. 数据暴力与生态劫掠：科学外衣下的资源掠夺

二战时期日本对缅甸的“地区研究”，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将科学研究作为资源掠夺的战略工具，服务于殖民统治的需要。比如横滨正金银行主导的“缅甸产业情况及缅甸大米出口情况”调查，通过“科学统计”，精准制定了“从产量到征用的比率”，并以此为依据确定“征用”缅甸粮食的数量。根据日本粮食管理局的记载，1942—1943 年日军陆续总共从缅甸强征 10 万吨大米，直接导致缅甸进入人为的饥荒时代，迫使缅甸农业社会驶入崩溃的边缘。^④ 1944 年，

① 中島健一：『缅甸の自然と民族』、丹波市町（奈良県）：養徳社、1944 年、第 297—303 頁。

② 国分正三：『ビルマのカレン族及パダン族の話』、東京：南洋經濟研究所、1944 年、第 18—21 頁。

③ 外務省調査部：『ビルマの統治機構』、東京：外務省調査部、1942 年、第 290—292 頁。

④ 食糧管理局：『米穀摘要・米麦関係法規』、東京：食糧管理局、1942 年、第 8—14 頁。

正值日本军事占领缅甸的最后一年，战败前夕的日本军政府在缅甸实施了“稻米种植计划”（Paddy Cultivation Scheme）。按照计划目标，日军首先是在缅甸农村地区快速组建起村级农业委员会，此举不仅有助于提高缅甸农业生产水平，还能在占领的末期在政治上巩固日军在缅甸的影响力。其次，该计划强制要求缅甸地主将土地出租给佃农，以确保土地的有效利用和战时粮食的稳定生产。再次，该计划还为日军通过农业贷款和配额分配等手段，进一步控制缅甸的农村经济提供便利。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使得缅甸人民更容易接受日军统治，从而说明“稻米种植计划”不仅是一项农业政策，更是日军在缅甸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通过组织农村、控制土地和提供经济支援，日军能够在缅甸实现其更广泛的战略目标。^①与之呼应，东亚研究所编撰的《缅甸的森林和木材》将缅甸的柚木年采伐量设定为 45 万立方米，该数据远超雨林再生能力 3 倍，通过“可持续发展”的伪概念将殖民掠夺合理化，掩盖生态灭绝危机。^②此类“数据暴力”的本质，是将学术方法论直接变为殖民榨取的精密算法——地理学测绘服务于军事通道选址，经济学模型沦为资源掠夺的指引，生态学知识则被扭曲为毁灭自然的借口。^③

2. 文化霸权与记忆政治：从语言驯化到宗教操控

在文化上，二战时期日本对缅甸的语言驯化和宗教操控是日本对缅甸所谓的地区研究呈现出的典型特征与成效，是以学术研究为媒介实现深层的文化殖民。冈本真一在《缅甸的矿产资源》里将日本殖民者对缅甸矿产资源的强制开采和要求缅甸矿工的强制劳动，用“技术培训”这样的字眼进行掩盖，试图以此来模糊日本对缅甸资源进行野蛮掠夺的本质。^④日军在占领时期编纂的《军用缅甸速成手册》，删

① 水野明日香：『日本占領下のビルマにおける稲作計画』、東京：山川出版社、2020 年、第 148—164 頁。

② 東亜研究所：『ビルマの森林と材木：ビルマ植生概観・ビルマ産主要樹種表』、東京：東亜研究所、1942 年、第 25—35 頁。

③ 横濱正金銀行調査課：『緬甸産業事情及び緬甸米輸出状況』、横浜：横濱正金銀行調査課、1937 年、第 2—5 頁。

④ 岡本真一：「ビルマの鑛産資源」、『國民經濟雜誌』、1941 年、第 72—76 頁。

除了缅甸抗英诗歌《孔雀旗飘扬》，替换为“日缅共荣”“天皇圣战”等宣传文本，从语言层面重构了缅甸军政界的历史记忆。日本缅甸协会调查部通过研究缅甸的宗教，联合军方将佛教寺院改造为“粮食征缴中心”，逼迫僧侣为征粮行动祈福，将宗教权威工具化为统治合法性符号。京都学派学者更炮制“佛教—神道同源论”，宣称“日本天皇是佛陀转世”，为军事占领披上神圣外衣。这种文化殖民的毒性在于：它不仅摧毁物质文明，更通过知识生产篡改集体记忆，使殖民逻辑渗入缅甸的精神基因。^①

（四）从殖民工具到知识正义：二战日本缅甸研究的伦理重构启示

日本学界在二战时期针对缅甸的“地区研究”凸显了学术研究被政治与军事目的绑架这一关键问题。当时日本的缅甸研究在殖民扩张语境下呈现出明显的工具化倾向和依附性，为当下的学术研究敲响了警钟。一方面，二战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活动深受军国主义的国家政策导向影响，地区研究和军事占领形成了附庸的关系，使学术丧失了应有的独立立场。另一方面，知识伦理反思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在二战背景下，日本学者在对缅甸的研究中，借助学术研究为殖民统治披上合法外衣，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学术伦理，为现代学术界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如何坚守伦理底线、维护学术独立提供了历史教训。

^① 日本ビルマ協会調査部：『ビルマの宗教』、東京：日本ビルマ協会調査部、1942年、第5—1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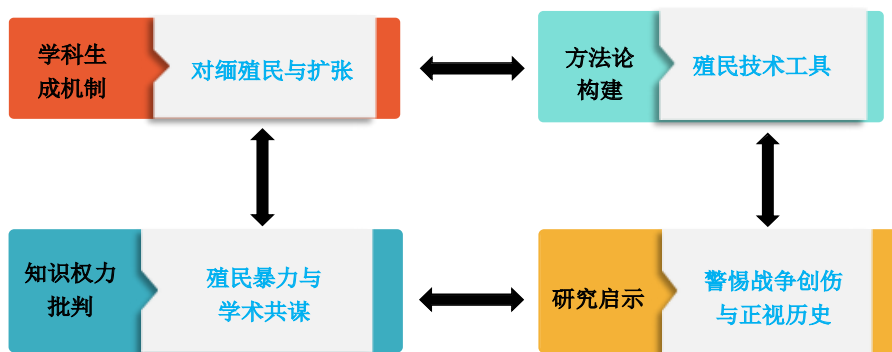


图1 二战时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政策实践互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1所示，二战时期，日本对缅甸的地区研究，形成了一个双向联动的模型。该时期的学科生成机制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在对缅甸的地区研究中“殖民与扩张”成为当时的研究重点，对当地的军事占领及资源掠夺成为研究的方向，当时的日本学者根据国家的利益导向大量使用殖民工具对缅甸进行全方位的“地区研究”，该时期的研究推动了日本对缅甸的殖民管理强化，同时实地数据反馈又进一步影响学术理论和军事实践。这种方式揭示了知识生产与暴力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日本在缅甸研究中学术与殖民行为的交织。二战时期，日本对缅甸的区域国别研究，深刻揭示了学术研究在权力裹挟下可能面临的异化风险。当时的地区研究，从知识探索退化为暴力工具，完全沦为殖民扩张的“技术手册”，丧失了学术独立性。比如外务省制定的《缅甸调研报告撰写规范》，要求所有缅甸研究必须包含“资源数据”“地缘价值”和“管控建议”三部分，完全服务于军政府的殖民掠夺目标。因此，为了更好地在之后的缅甸区域国别研究中避免以上问题，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波多野澄雄在研究中承认了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协作”是优先考虑经济利益的经济协作，利用赔款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日本的复兴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这在事实上淡化了日本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和反省，作者认为需要与受害国达成和解，日本政府应该深刻反省战争的过

错。^① 同样，保城广至认为“二战后日本主导的东南亚发展基金构想遭遇挫折”是因为日本在二战期间入侵东南亚国家，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战后东南亚各国对日本心存芥蒂和防备，对其倡导的开发基金持怀疑态度。东南亚国家刚摆脱殖民统治，自身缺乏经济合作的制度，对日本倡导的开发基金认同感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合力。此外，缺乏对受害国家“区域创伤记忆档案”的创建和对历史债务的认识模糊不清同样也是导致日本东南亚开发基金失败的原因之一。而日本学者只有正视历史创伤，推动逆向知识返还才能在之后的区域国别研究中避免走历史的老路。^②

二、冷战初期日本缅甸研究的范式矛盾与权力逻辑： 学术救赎与战略重构的双重奏

冷战初期，日本对缅甸的研究呈现出独特的“双重性”，既是战败国摆脱殖民污名的学术救赎，又是新国家主义的知识重构。通过《日缅赔偿协定》，日本将学术研究包装为“知识赔偿”，以宪法比较和技术援助构建“和平贡献者”身份，试图洗刷殖民污名，但实质上延续了资源控制目标，形成“新殖民契约”。这一阶段，日本学者将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强调应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将数据收集聚焦战略资源与地缘风险评估领域，将学术研究作为“科学化资源监控”工具。与此同时，日本学者还通过“民主化经验交流”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将学术话语转化为柔性权力渗透的手段，同时以“技术中立”为包装进行基建援助，实际上通过专利控制维系经济依附关系。这些特点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在冷战初期对缅甸研究的策略性行为，也揭示了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日本学界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了一定的

① 参见：波多野澄雄：『「政府間和解」と歴史問題に関する基盤的研究—戦争賠償の再検討を中心に—』、『2013年度研究成果報告書』、筑波大学、2013年6月、第1—5頁。

② 保城広至：『岸外交評価の再構築：東南アジア開発基金構想の提唱と挫折』、『国際関係論研究』、巻17、2001年9月、第57—80頁。

对话，此举推动了缅甸研究的国际化，这是这一时期日本地区学界对缅甸研究的积极贡献。

（一）学科生成机制：国家需求与学术自主的互动

二战结束后，日本对缅甸的“地区研究”经历了从战时的殖民主义到冷战初期“国家需求”的范式转变。二战后日本的对外交往是战争时期的军事侵略模式转变为以经济赔偿和外交活动为重心的和平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日本对缅甸的研究也随之转型，从战时的军事情报和战略资源分布情况的收集转为以经济合作和地缘战略分析为核心的学术研究方向。

1. 地缘政治驱动下的学科定位

冷战初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学科生成机制，体现为国家需求与学术自主的复杂互动。随着日本战后重建及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地区研究的主体从战时军事机构（如大东亚省）转向外务省、通商产业省等经济与外交导向的政府机构，同时有学者开始开展独立研究。

二战后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勃兴，本质是对“脱殖民化”与“再国际化”双重命题的回应。缅甸作为“非同盟运动轴心国”与“东南亚资源枢纽”，再次成为日本重构亚洲知识体系的试验田。冷战初期，外务省亚洲局的《缅甸联邦事情》将缅甸定义为“中立主义实验室”，系统分析其不结盟政策对美苏阵营的制衡效应，标志着日本地区研究从“殖民情报学”向“地缘战略分析”的范式转型。^①具岛兼三郎对缅甸“国内叛乱—经济停滞”循环的研究，揭示区域国别研究需同时关注“国家行为体”与“次国家行为体”（如少数民族武装）的互动，奠定跨层级分析的方法论基础。^②

虽然定位与方法有所改变，但这一时期日本地区研究的目的仍然

① 外務省アジア局第四課：『ビルマ連邦事情（亜四資料；第 48 号）』、東京：外務省アジア局第四課、1954 年、第 15—31 頁。

② 具島兼三郎：『ビルマ獨立論：太平洋戦争によるビルマの政治的变化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法政学会、第 19 期、1952 年、第 25—40 頁。

是维护国家地区战略。外务省赔偿部的报告《缅甸赔偿和贸易》，通过量化缅甸战争损失与日本经济承受力，创建了“实物赔偿+技术援助”模型，直接促成《日缅赔偿协定》签署。^①外务省亚洲局《缅甸福利国家计划》将水电站、农机具援助包装为“立人理念”，实质为日本重获东南亚市场准入铺路。^②众议院法制局的日缅宪法对比研究，表面为“亚洲民主化经验交流”，实则输出日本“和平宪法”价值观，服务于战后身份重塑。^③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缅甸经济合作报告书”量化缅甸本国的资源潜力，论证“实物赔偿+经济合作”模式的可行性，直接服务于谈判策略制定。^④

2. “国家—学术”复合结构的转型

冷战初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国家—学术”复合结构经历了从战时殖民工具向“政策—学术”协作的范式转型。首先，研究机构更替，战时机构退出与战后体系重建。二战时期，主导缅甸研究的大东亚省、陆军省等军事殖民机构随战败解体，其知识生产的“资源掠夺—军事管控”逻辑被彻底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以通商产业省、外务省为核心的政府机构，其研究目标转向经济合作（如《缅甸赔偿和贸易》报告）、技术援助（如《缅甸农业振兴计划》）及地缘平衡（如《缅甸联邦宪法比较研究》），服务于日本战后“经济立国”与“和平外交”战略。大学与智库（如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开始承担独立研究职能，例如对缅甸宪法的系统性分析（《缅甸联邦宪法》），既为日本民主化进程提供参考，也标志着学术研究从“殖民工具”向“理论建构”的转向。其次，知识生产闭环的初步形成，政策需求与学术反馈互动，形成“需求—供给”动态机制：国家通过资金支持与议题设定（如赔偿问题、农业技术合作）引导学术发展，例如通产省委托学者（如米泽秀夫）研究缅甸独立后的经济政策，为《日缅赔偿协定》谈判提供理论依据；^⑤同时，学者个人的实证研究（如盛永俊太郎的缅甸水稻问题分析）通

① 外務省賠償部：『ビルマ賠償と貿易』、通商産業省賠償室編、東京：商工会館出版部、1956年、第11—33頁。

② 外務省アジア局第四課：『ビルマ「福祉国家」計画』、東京：外務省アジア局第四課、1952年、第58—78頁。

③ 衆議院法制局：『ビルマ連邦憲法』、東京：憲法調査会事務局、1956年、第10—20頁。

④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ビルマの経済開発』、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61年、第13—78頁。

⑤ 米澤秀夫：『ビルマ連邦の政治と経済』、『中国研究所所報』、第16巻、1948年、第12—19頁。

过数据反馈优化援助方案，形成“政策制定—学术验证—政策修正”的闭环。^① 尽管研究仍受制于冷战意识形态，但学者开始尝试应用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如西田龙雄的缅甸历史语言学），并关注被政策忽视的“边缘议题”（如缅甸少数民族语言、社会阶级矛盾），为学科注入批判性维度。^②

（二）方法论构建：冷战初期日本缅甸研究的实证化与跨学科转向

冷战初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方法论经历了从战时的殖民实用主义逐渐过渡到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过程。这一演进过程既受日本战后学术重建的影响，也服务于其经济外交战略的需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逐渐成形。

1. 实证研究的深化：从殖民掠夺数据到科学化调查

首先，数据驱动研究的制度化，政府机构（比如外务省和通产省）通过系统性统计与实地调查构建了缅甸的经济发展模型。例如，外务省经济局《最近的缅甸联邦经济事情》，基于农业、林业出口数据量化分析了缅甸的经济结构，为援助项目选址“马圭省水库”提供了依据。^③ 日本驻缅甸大使馆的《缅甸主要出口原材料调查》通过供应链分析“生产—出货—销售”评估资源获取效率，直接服务于通产省的贸易政策调整。^④ 其次，田野调查的应用，突破“书斋研究”局限，学者们开展了在地化实证研究。例如，盛永俊太郎对缅甸水稻收成问题的田野调查，结合土壤采样与农户访谈，提出农机具适配性改进方

① 盛永俊太郎：「日本におけるビルマ普通稻の不出穂性」、第6号、『農業技術協会』、1951年、第46—48頁。

② 西田龍雄：「ビルマの言語調査」、『民族學研究』、第25卷、1961年、第84—86頁。

③ 外務省經濟局アジア課：『最近のビルマ連邦經濟事情』、東京：外務省經濟局アジア課、1960年、第141—160頁。

④ 在ビルマ日本大使館：『ビルマの主要輸出原材料の生産・集荷・販売機構の実態調査』、東京：外務省經濟局アジア課、1961年、第15—22頁。

案，推动日本对缅农业技术援助（如农机具推广）的精准化。^①黑崎英雄的《缅甸的金融事情》，通过日本金融机构对缅甸农村地区系统实地考察，揭示计划经济下金融管制的结构性矛盾，挑战政府“技术援助万能论”叙事。^②

2. 跨学科方法的引入：从单一经济视角到多维分析框架

首先是政治经济学融合，学者将经济分析与政治动态结合。例如，具岛兼三郎的《太平洋战争后的缅甸政治变化》，以阶级分析解释经济援助的资本属性如何加剧缅甸内部叛乱，提出“外部干预—内部矛盾”联动模型。^③这种研究不仅揭示了缅甸内部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也为日本学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缅甸的政治经济动态。外务省亚洲局的《缅甸福利国家计划》，评估基建援助（如水电站）时，引入社会成本—收益分析，讨论工业化对传统村落结构的冲击。语言学与历史学交叉方面，西田龙雄的《缅甸语言调查》，通过历史语言学方法，分析缅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玛鲁语、拉西语）的谱系关系，为解构缅甸民族矛盾提供了文化视角。^④日本众议院法制局的宪法比较研究，结合法律、史学与政治学理论，对比《缅甸联邦宪法》与《日本国宪法》，从中探索亚洲新兴国家宪政路径的独特性和政策研究的结合。

（三）知识权力批判：冷战初期日本缅甸研究的隐性霸权与学术遮蔽

冷战初期，日本对缅甸的知识生产虽标榜学术化与中立性，实则深嵌于“新殖民主义逻辑”与“冷战意识形态”的权力网络中。

① 盛永俊太郎：「日本におけるビルマ普通稻の不出穂性」、第6号、『農業技術協会』、1951年、第46—48頁。

② 黑崎英雄：『ビルマの金融事情』、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62年7月、第65頁。

③ 具島兼三郎：「ビルマ独立論 - 下 - 太平洋戦争によるビルマの政治的变化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法政学会』、第19期、1952年、第1—44頁。

④ 西田龍雄：「ビルマの言語調査」、『民族學研究』、1961年、第85頁。

首先，学术话语的政治化重构。通过对殖民历史的解构性再诠释与“双向互惠”意识形态的符号化生产，实现历史暴力记忆的系统性遮蔽。外务省亚洲局在《缅甸赔偿和贸易》报告中强调“日本协助缅甸摆脱英国统治”，将殖民侵略美化为“解放者”角色，以此换取缅甸在赔偿问题上的宽容。这种“互惠叙事”掩盖了日本战时对缅甸的掠夺（如“缅甸铁路”劳工死亡事件），为《日缅赔偿协定》赋予道德合法性。又给技术援助披上“文明使命”的包装，如外务省的《缅甸福利国家计划》，将基建援助（如水电站、农机具）包装为“立人理念”，暗示日本通过技术转移“启蒙”缅甸，延续了战前“文明同源论”的文化霸权逻辑，淡化经济合作中的资源获取实质（如缅甸稻米出口监控）。

其次，经济研究的霸权性。发展主义话语下的新殖民逻辑，体现在资源监控与“科学”掠夺。如通产省的《缅甸与巴基斯坦贸易研究》及外务省经济局的《缅甸主要出口原材料调查》，以“区域经济整合”为名，通过供应链分析（生产—出货—销售）构建缅甸资源数据库，为日本控制东南亚“资源走廊”（如木材、稻米）提供“科学依据”。还体现在发展主义的单向输出：米泽秀夫对缅甸经济政策的研究，将日本战后“政府主导型经济”经验预设为普世模式，批判缅甸国有化政策的“低效”，却忽视其反殖民遗产（如去英国化）诉求。这种“现代化理论”的话语霸权，将缅甸经济困境归因于“政策失误”，而非结构性不平等。

（四）批判性视角：冷战初期日本缅甸研究中知识—权力的共生启示

冷战初期，日本学术研究在服务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尽可能地维持本国的学术独立与批判。首先，冷战初期的日本学者在国家政策转型背景下逐步挣脱战时殖民工具的束缚，迈向独立的学术化研究道路。这表明学术研究应在满足国家需求的同时，保留一定的自主性，避免沦为政策的附庸。

其次，尽管冷战初期日本学者的研究相较于二战时期逐渐学术化，

但其研究仍受到二战时期的战时需求和冷战初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隐性霸权和学术遮蔽等问题。许多学者通过“互惠叙事”掩盖殖民历史，或借助发展主义话语推广单一的现代化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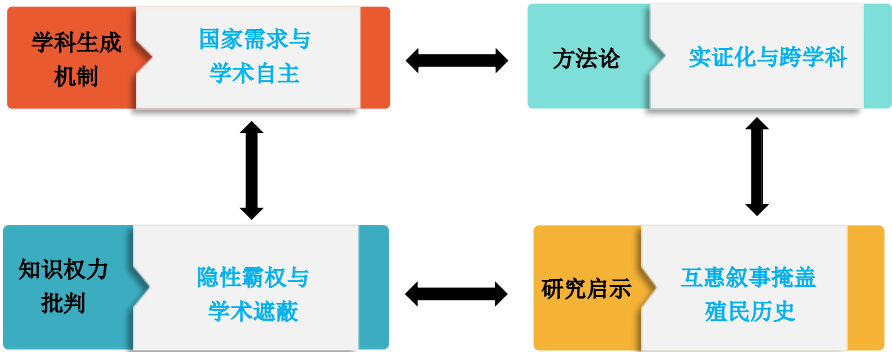


图2 冷战初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政策实践互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2所示，冷战初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学科生成机制呈现出“国家需求驱动知识生产，学术研究反哺政策优化”的机制，具体来看，该时期学术架构与经济合作和赔偿外交紧密相关，学术研究为经济合作与赔偿外交提供支持。从方法论上看，该时期注重实证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结合，如外务省《缅甸赔偿和贸易》报告中的赔偿数据建模，为《日缅赔偿协定》谈判提供了经济补偿计算模型；又比如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缅甸宪法的研究，为日本向缅甸输出“民主化经验”供应理论依据。经济合作与赔偿外交中的“技术援助”条款为学术理论构建提供契机。如《日缅赔偿协定》中四大工业化项目催生了学术界对缅甸工业化路径的理论探讨，米泽秀夫的研究就是典型例子。

与之前相比，冷战初期与二战模型的本质存在差异，首先是目标转换，从“军事占领与资源掠夺”转向“经济合作与赔偿外交”，淡化暴力实践，强调发展叙事。其次是知识工具升级，理论构建从“资源分布报告”升级为“赔偿数据建模”和“宪法比较”，体现学术化与政策精细化。最后是反馈机制，实地数据从“开采数据、掠夺资源”变为“经济调查、农业统计”，凸显冷战初期“技术中立”包装下的新殖民逻辑，而“殖民工具”的转变并不能遮蔽日本在冷战初期对缅甸研究的隐性霸权与学术遮蔽。

三、冷战中后期日本缅甸研究的多元化： 知识深化与拓展

冷战中后期，日本和缅甸之间的关系又进一步发展，1963 年日本不仅结束了对缅甸的战争赔偿，又在同一年和缅甸签署了《日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日本的缅甸研究逐步从单一的政策依附性研究工具，转型为一个具有较高学术独立性和国际影响力的学科体系。在研究方法上以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融合方法为主；研究内容上又涵盖了缅甸的社会结构、政治环境等多个关键领域。这些转变不仅凸显了日本学术界对缅甸研究的持续探索与创新精神，而且为全球学术界提供了理解缅甸历史与现实的更为丰富多元的视角。

（一）学科生成机制：冷战中后期日本缅甸研究的制度化 与国际化转型

冷战中后期，日本对缅甸的研究在既有范式转换的基础上，实现了深度增加和广度扩展。这一转变既是对冷战格局动态变化中日缅关系发展的积极适应，也是日本学术界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走向成熟的集中体现。冷战中后期，日本学界呈现出“国家战略需求深化”与“学术自主性制度化”的双重演进特征。在这一阶段，区域国别研究逐步摆脱了对政策的单纯依附，将研究领域扩大至民族特性、制度发展等领域，使其成为具有独立性和系统性的学科体系。

1. 国家战略驱动：经济外交与地缘安全的双重嵌入

首先，经济安全导向的研究网络构建。日本政府通过国际合作事业团和亚洲经济研究所等国有机构，将缅甸研究深度嵌入“资源—市场—能源”战略网络。例如，国际合作事业团的《伊洛瓦底流域农业

开发计划》，系统性调查缅甸农业资源分布，为日本获取稻米、木材等战略物资提供数据支持。^① 外务省经济合作局的报告《缅甸自力更生路线与日本合作》，将缅甸经济政策与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绑定，论证对缅援助在抵御共产主义扩张中的地缘价值。^② 其次，能源安全研究的制度化。随着石油危机爆发，日本对缅甸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关注显著升级。松泽明的《缅甸石油分布情况》等研究，通过地质勘探数据建模，为三井物产、住友商事等财阀投资提供决策依据，形成“学术勘探—企业投资—政府担保”的联动机制。^③

2. 学术自主性的制度化：大学研究机构与国际网络的形成

首先，大学学科体系和研究机构的专业化。京都大学设立东南亚研究中心，推动缅甸研究从分散式学习升级为系统学科；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开辟以东南亚国家为首的地区研究。^④ 例如，大野徹编撰的《缅甸式社会主义》研究，整合经济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多种方法，成为区域国别跨学科研究的范式。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通过“缅甸佛教与社会结构”长期项目，培养专业学者（如生野善应），构建佛教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又比如 20 世纪 70—80 年代，随着美苏在东南亚的博弈加剧，日本作为美国盟友需强化对东南亚的“非军事介入”，经济合作与文化渗透成为主要手段。缅甸作为中南半岛重要国家，是日本扩大区域影响力的关键节点。

其次，东京外国语大学作为日本国内两所外语院校之一，继大阪外国语大学之后，于 1981 年开设缅甸语专业，标志着日本学界从传统的“英语圈”转向对东南亚语种的系统性投入，目的是培养精通缅

① 国際協力事業団：『ビルマ社会主義共和国イラワジ川流域農業総合開発計画実施調査現地報告書』、東京：国際協力事業団、1973 年、第 64—74 頁。

② 外務省経済協力局：『ビルマの自力更生路線とわが国の経済協力：ビルマ経済協力調査団報告書』、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72 年、第 85—105 頁。

③ 松沢明、川村隆：『ビルマの石油事情』、東京：外務省経済局アジア課、1967 年、第 17—27 頁。

④ 所長挨拶・沿革 | 京都大学東南アジア地域研究所。1963 年、東南アジアの総合的研究を担う部局として京都大学内に東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が発足しました。センターは 1965 年に官制組織となつて以降、大学院農学研究科、人間・環境学研究科、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科、医学研究科への協力講座の提供を開始、2004 年には京都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所へと改組しました。1994 年に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内に設置された地域研究企画交流センターを淵源として、2006 年、地域情報資源の統合と相関型地域研究の推進をミッションとする京都大学地域研究統合情報センターが東南アジア研究所の協力により発足しました、参見：<https://kyoto.cseas.kyoto-u.ac.jp/message/>。

甸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者和实务人才，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支持。缅甸语专业的设立，不仅服务于语言教学，更通过语言研究深化对缅甸社会结构、历史记忆的解析。该校注重“目标国家语言的政治、文化、习俗研究”，这与日本试图通过文化认同增强对缅影响力的目标一致。^①

（二）方法论演进：“政策工具”向“批判性学科”的范式跃迁

冷战中后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方法论经历了从实证化、跨学科化向批判性、全球化的转型。这一演进既受国际学术潮流的影响，也服务于日本经济外交战略的升级需求，具体表现为田野调查深化、理论工具创新、学科边界突破及批判视角增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

1. 实证研究的系统化：从数据采集到长期跟踪机制

首先，田野调查的制度化。国有机构（如国际合作事业团）通过长期跟踪调查构建缅甸社会经济的动态模型。例如，《伊洛瓦底流域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实施调查》连续 10 年监测缅甸农业产出、技术接受度与生态变化，形成“援助—反馈—调整”的闭环机制。日本驻缅甸大使馆的《缅甸主要出口原材料调查》，采用供应链分析法，将资源开采、物流网络与全球市场波动关联，为通产省的贸易政策提供实时数据支持。其次，微观实证的突破。学者突破宏观政策叙事，聚焦基层社会动态。例如，大野徹的《缅甸贱民社会的发生和现状》，通过村落参与式观察，揭示种姓制度与殖民遗产的交互作用，挑战政府“技术援助万能论”的单一叙事。^②伊野宪治的《缅甸民主化运动与少数

① 専攻言語案内 | 言語文化学部 | 学部・大学院 / 教育 | 東京外国語大学、本専攻は、ビルマ語を体系的に学べる専攻として国内で 2 番目に、1981 年に設立されました。ビルマ研究は歴史的に英国（ロンドン大学）が中心でしたが、その後フランス、米国などと並び、日本も有数の研究拠点と認識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きます、参見：<https://www.tufs.ac.jp/education/lc/languages/>。

② 大野徹：『ビルマにおける賤民社会の発生とその現状』、京都：東南アジア研究、1969 年 7 卷 2 号、第 209—216 頁。

民族问题》，结合克钦族武装的田野访谈与档案分析，指出日本援助政策忽视少数民族权益的结构性缺陷。^①

2. 跨学科方法的整合：从多元视角到理论创新

首先，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史融合。佐久间平喜的《缅甸不结盟政策》，引入地缘经济理论，分析缅甸中立外交如何通过“资源杠杆”（如木材出口）平衡美苏影响力，提出“小国战略自主性模型”。^②北村隆男的《缅甸史说概要》，结合后殖民理论，批判“现代化线性叙事”，强调殖民遗产与冷战干预如何共同塑造缅甸的政治断层。^③其次，技术科学与人文研究的交叉。国际合作事业团的《仰光铁路电气化计划预调查报告》，采用工程社会学框架，评估基建项目对城市移民、宗教社区的影响，突破传统“效率—成本”分析模式。^④平木光二的《缅甸的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力》，运用宗教人类学方法，解析僧侣阶层如何通过抗议活动重构政治合法性，为“佛教民主化”理论提供实证基础。^⑤再次，语言学与历史学的协同。西田龙雄的缅甸语研究从单纯语言谱系分析转向社会语言学批判，他在“缅甸语言的比较分析”中主要探讨了克钦语（Kachin language）及其巴莫方言（Bamo dialect）的特征。^⑥作者认为在比较语言特征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各语言的历史发展和条件差异，而不仅仅是音素的性质。

① 伊野憲治：『ミャンマー民主化運動と少数民族問題』、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114—138頁。

② 佐久間平喜：「ビルマの非同盟・中立政策」、東京：外務省第一国際情報官室、『外務省調査月報』、1974年15号1巻、第1—6頁。

③ 北村隆男：『ビルマ史概説年表：太平洋戦争終結まで』、高槻：北村隆男、1985年、第70—95頁。

④ 国際協力事業団：『ビルマ社会主義連邦共和国ラングーン鉄道環状線電化計画事前調査報告書』、東京：国際協力事業団、1983年、第8—15頁。

⑤ 平木光二：「ミャンマーにおける宗教権威と政治権力」、『印度學佛教学研究』、1995年44巻1号、第316—320頁。

⑥ 西田龍雄：「カチン語の研究——バモ方言の記述ならびに比較言語学的考察」、『言語研究』、1960年9月第1—32頁。

（三）知识权力批判：冷战中后期日本缅甸研究的新殖民逻辑与学术霸权

冷战中后期日本对缅甸的知识生产，虽以“学术化”“全球化”为表，实则深嵌于“技术霸权”与“民主化叙事”的权力网络中，呈现出更为隐蔽的新殖民主义特征。

1. 技术援助的霸权性：知识包装下的资源控制

首先，“绿色援助”的生态殖民。国际合作事业团的《伊洛瓦底流域农业开发计划》，以“可持续发展”为名，通过水利工程和农业技术转移，控制缅甸稻米、木材等战略资源流向。日本学者（如鹤助治的林业研究）将生态破坏归咎于“缅甸管理不善”，掩盖日本资本通过技术标准垄断（如农机具专利）获取超额利润的实质。^①其次，能源勘探的学术渗透。松泽明的《缅甸油田开发》，表面为地质学研究，实则服务于日本全国的能源布局，研究数据通过“学术合作”名义共享，用于调查团赴缅甸开展系统性地质勘探基于该报告，日方迅速启动地震勘探验证（SSL），并于 1964 年在缅昂构造顶部实施深度达 3350 多米的首口探井钻探，此举为日本企业优先竞标缅甸油田提供情报支持，形成“学术探路—企业跟进—政府担保”的新殖民链条。^②

2. 权力视角下的叙事与研究。民主化工具与文化殖民的交织

首先，“民主援助”的双重标准：工藤年博的《日本对缅甸援助政策变迁》，将援助与民主化进程绑定，批判军政府人权记录，却回避日本对缅投资（如仰光铁路电气化）如何强化军政府财政基础。^③

① 鹤助治：「ミャンマーにおける森林・林業とタウンヤ農民の現状」、『熱帯林業』、1993 年第 26 期、第 13—20 頁。

② 松沢明：「ビルマにおける油田開発」、『日本鑛業會誌』、1967 年 83 卷 955 号、第 1253—1255 頁。

③ 工藤年博：「日本の対ビルマ援助政策の変遷と問題点」、『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通信』、1993 年 79 期、第 1—18 頁。

这种“价值观外交”服务于日本在东南亚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地缘目标。其次，宗教研究的政治化。生野善应的《缅甸佛教：实态与修行》，梳理了缅甸佛教史，论证僧侣阶层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为日本援助寺院学校（如《缅甸福利国家计划》）提供理论依据。^①这种“佛教治理”叙事延续了战前“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渗透策略，目的是培养亲日宗教精英。再次是语言教育的同化逻辑：岩内健二的《缅甸的文化和教育》，将乡村佛教教育贬为“传统滞后”，鼓吹现代化教育模式（如日语培训项目），实质是推动文化同化，为日本软实力扩张铺路。^②

冷战中后期日本缅甸研究的“知识权力”批判首先揭示了技术霸权的升级，从冷战初期的“经济援助”转向“技术标准垄断”，以“可持续发展”“民主化”话语掩盖资源控制实质。其次是学术殖民的全球化，通过国际学术网络与跨国资本联动，将缅甸塑造为“民主化试验田”与“资源供给地”，以巩固日本在东南亚的等级秩序。再次是批判的悖论性：个人学者的反思受限于国家资助与冷战意识形态，难以突破“发展主义”的总体框架。这一批判警示当代区域国别研究：需直面“学术全球化”背后的新殖民逻辑，在理论创新中强化南方视角，避免知识生产沦为霸权扩张的精致工具。

（四）制度化与数据化的批判性：冷战中后期的研究反思

冷战中后期，随着日本学界对缅甸研究的逐步深入，其学术研究开始显露出制度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当时的日本学者通过建立专门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并且频繁地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缅甸研究在制度化和国际化方面的发展。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让缅甸研究变得更加系统和专业，另一方面也提升了缅甸研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① 生野善应：『ビルマ仏教：その実態と修行』、東京：大蔵出版、1975年、第270—280頁。

② 岩内健二：「ビルマの文化と教育」、『拓殖学研究』、1971年第3号、第30—4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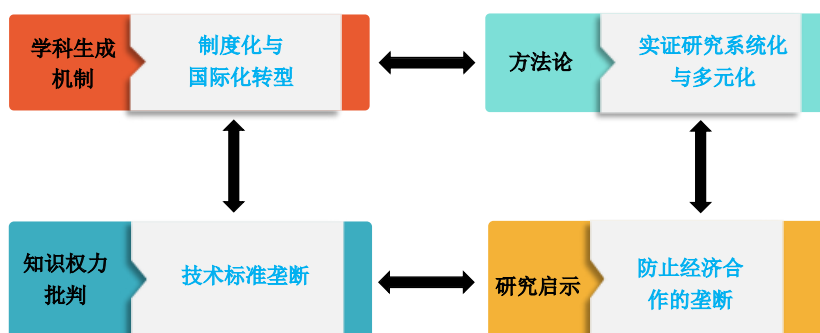


图3 冷战初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政策实践互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 3 所示，在冷战中后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学科生成机制呈现出制度化与国际化的转型，该时期强调“学术架构服务全球战略、批判研究制衡权力扩张”的基本目标。一方面，该时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方法呈现多元化和系统化，如可持续发展模型为日本对缅“绿色援助”提供分析框架，强调生态保护与经济收益平衡；而民主化理论将援助包装为“价值观外交”，推动日本介入缅甸政治转型。日本基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要求学术机构评估缅甸在“东南亚战略”中的支点价值，强化“学术—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区域渗透。另一方面，全球化转向促使日本学界从冷战初期的“双边互动”升级为“跨国网络”，例如日本通过东盟框架将缅甸研究纳入区域一体化议程；批判性知识生产中，个人学者突破政策叙事，揭露援助的“新殖民性”与“技术霸权”；数据监控技术化表现为实地反馈从农业统计升级为卫星遥感（资源勘探）、大数据分析（社会冲突预警），体现知识权力的技术强化和日本对缅甸研究的技术标准垄断。同时，跨国数据反馈推动政策调整与区域战略优化，如石油勘探数据推动日本调整对缅投资策略，优先布局能源基础设施；能源安全合作催生“资源民族主义”批判理论，揭示日本投资加剧缅甸资源主权争议。这一模型直观呈现了冷战中后期日本缅甸研究中的双向张力。

四、全球化交织下的缅甸研究： 日本学术视野的转向与重构

冷战结束后，日本与缅甸的关系呈现多样化的互动。经济上，日本首先在 2012 年由野田佳彦政府免除了缅甸 37 亿美元的贷款，接着安倍政府又在 2013 年进一步免除了缅甸 2000 亿日元的债务；此外，日本作为缅甸的重要经济和贸易合作伙伴，积极支持缅甸的民主化进程，逐步恢复并加强了与缅甸的外交关系，并于 2013 年重新启动了对缅甸的官方发展援助。政治上，吴登盛和昂山素季分别在 2012 年和 2013 年访问日本，作为回访，安倍晋三于 2013 年访问缅甸，成为 1977 年以来第一位访问缅甸的日本首相。两国的上述互动为日本学界在 21 世纪以宏观性的视角重新展开对缅甸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更多的日本学者运用跨学科和比较分析方法充分研究了缅甸的众多领域。

21 世纪以来，研究缅甸的日本学术机构变得多样化起来，从官方到民间的各类机构都对缅甸展开了细致研究。借着众多项目合作和实践经验积累了不少数据，为制定地区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撑。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重点主要围绕缅甸的当代外交政策、区域安全问题以及区域合作进展等方面。研究越做越深入，和缅甸相关的专著、学术论文也越来越多。

（一）21 世纪日本的缅甸研究：全球化协作与批判性制度化的学科生成机制

21 世纪日本对缅甸研究的学科生成机制，呈现出“国家战略—学术网络—全球话语”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其核心在于全球化协作深化、数字化技术驱动及批判性知识生产的制度化。

1. 国家战略升级：从经济援助到印太地缘博弈

首先，“民主化援助”与地缘竞争。日本外务省通过“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框架，将对缅研究嵌入区域安全议程。例如，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的《缅甸、柬埔寨的选择：对地区秩序的影响与日本的应对》，分析了缅甸在“中国—东盟”博弈中的支点作用，为日本拉拢缅甸制衡中国提供理论依据。^①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基建援助（如仰光环状线电气化）以“发展合作”为名，实质服务于日本企业（如三菱重工）抢占东南亚基建市场。^② 其次，经济安全的数据化监控。财务省的《缅甸金融市场与中小企业融资》，通过大数据分析缅甸金融脆弱性，为日本银行（如三菱、日本联合金融控股集团）进入缅甸市场提供风险评估模型，形成“学术报告—政策背书—资本渗透”的闭环机制。^③ 此外，日本学者武岛良成在 21 世纪初重新研究日本对缅甸的国立银行政策及“缅甸化”政策，这与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动向和现实政治需求密切相关。首先，从学科生成机制视角看，这种研究复兴体现了“历史政策服务于现实战略”的双重性：表面上是学术反思（如批判战时经济控制的虚伪性），实则暗含对冲其他国家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意图。例如，日本通过重提战时国立银行政策中“支持缅甸货币自主”的历史叙事，试图为 21 世纪对缅基础设施投资（如蒂洛瓦港升级项目）赋予“非殖民”合法性。其次，对“缅甸化”政策的重新分析（如排斥英语、推广缅甸语及使用缅甸日历）被纳入印太安全框架，此举用于论证日本对东南亚文化自主性的“历史贡献”——2016 年“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明确提出通过文化纽带强化区域软实力竞争，而纪念碑建设、法律用语缅甸化等具体措施的研究成果，成为日本塑造“亚洲文化保护者”身份的关键论据。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研究亦包含学术共同体对殖民历史的批判性重构，日本学者通过解构“缅甸化”政策的内在矛盾（表面促进民族认同，实则

① 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ミャンマー・カンボジアの選択：地域秩序への影響と日本の対応』、東京：平和・安全保障研究所、2000 年、第 10—20 頁。

② 国際協力事業団：『ミャンマー国経済構造調整政策支援調査最終報告書』、東京：国際協力事業団、2003 年、第 1—16 頁。

③ 財務省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総務研究部『ミャンマーにおける金融市場の現状と中小企業金融の課題』、日本財務省、2020 年版、第 2—38 頁。

巩固日本统治），挑战了“日本解放亚洲”的传统叙事，这种批判性制度化趋势反映了日本区域研究从“政策附庸”向“知识自主”的转向，但其结论仍常被政府用于战略话语包装，凸显了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博弈。^①

2. 官产学媒的合作：全球化浪潮中的多元协作网络

首先，21 世纪初，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亚洲经济研究所和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相继成立“缅甸研究中心”，研究范围涵盖日本企业对缅甸的投资数据和风险分析（如丰田供应链）、两国的进出口贸易（如关税政策）、政府政策（如 CPTPP 条款）与学术理论（如新制度经济学），制定对缅投资“合规指南”。^② 其次，国际学术机构的参与。日本学者通过亚洲政经学会（JAAS）等平台，将缅甸研究纳入全球区域研究议程。例如，大矢根聪的《缅甸变化与区域国际结构——区域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交点》，分析了缅甸在与国际结构的互动中表现出一种选择性引入和阻止的策略，这种策略反映了其与国际体系的特殊关系。一方面，缅甸与国际结构处于一种“疏耦合”状态，这意味着它并未完全融入国际体系，而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状态使得缅甸能够选择性地接受或拒绝国际结构的影响。^③ 另一方面，2008 年缅甸颁布新宪法后，本国的国内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其贸易、经济、投资等领域的法律体系建设为了更快地跟上全球化进程而大力发展，所以日本对缅甸的重点支援方向就放在了培养法律人才上。当时很多日本企业也纷纷把缅甸当作投资热土，对缅甸的法律信息需求日益增加。一些日本学术机构也加强了与缅甸的合作。首先是名古屋大学于 2013 年 6 月与缅甸仰光大学签订学术交流协定，并在仰光大学设立缅甸日本法律研究中心。借助该中心，名古屋大学在仰光大学开展众多人才培养项目，如培养市场经济法律人才的日本示范支持项目（Japanese Demonstration Support Project），

① 武島良成：「日本占領期ビルマにおける国立銀行問題」、『史学研究会』、2009 年 3 月 92 卷 2 号、第 388—421 頁；武島良成：「日本占領期のビルマにおける「ビルマ化」政策」、『京都教育大学紀要』、2007 年 3 月 110 卷 3 号、第 31—49 頁。

② ミャンマー | アジア - 国・地域別に見る - ジェトロ、参見：<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mm>。

③ 大矢根聡：「序論：ミャンマー政変と地域・国際構造—地域研究理論研究の交点から」、『アジア研究』、2023 年 69 卷 3 号、第 18—34 頁。

培育医疗精英和行政人才的九洲大学青年领导者项目（Young Leaders Program）等。法律层面上，日本名古屋大学相继接收了来自缅甸最高法院和法务长官府等机构的留学生，进一步将他们培养成为企业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合作至今已经培养了 80 余名优秀校友。另外，2013 年 6 月，名古屋大学成立了缅甸校友分会，这些校友作为政府和大学的骨干力量，在缅甸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日本政府和大学通过上述举措实现了多重外交目标和国家利益。经济上，随着缅甸市场经济推进，日本通过培养法律人才，为本国企业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确保企业投资运营的法律保障，促进对外贸易的拓展和经济利益获取。政治上，通过教育合作和人才培养等手段，增强日本在缅甸的政治影响力，巩固其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地位，培养亲日的法律和政治精英，助力日本在缅甸政治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护政治收益。^①

另外，日本缅甸友好协会通过田野调查收集缅甸少数民族（如克钦族）的口述史，为学界的殖民遗产研究提供底层视角，该研究同时被外务省用于塑造“日本人权卫士”的形象。^②在数字化知识生产方面，日本学者大量采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和收集缅甸资源分布的信息，并通过对缅甸农村地区资源状况、市场需求制定商业策略。在缅甸达贡山镍矿区的信息提取和动态监测中，研究者利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为矿业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为相关企业的商业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日本亚洲农村研究会借助技术手段，实现了学术研究、安全预警和商业决策的动态结合^③。其他方面，日本缅甸协会（JMA）在 2012 年创立期刊《聚焦缅甸》（*MYANMAR FOCUS*），以此来提高学界和各方对缅甸的新认识，该期刊自创办以来核心内容多强调日

① 基本情報 | ミャンマー | 日本法教育研究センター、これまで、名古屋大学は、ミャンマーに対して人材育成無償支援（JDS）事業により市場経済化に必要な法整備のための人材や、アジア諸国のナショナル・リーダーを養成するヤング・リーダーズ・プログラム（YLP）により医療行政に携わる人材を育成してきた。法律分野では、これまで最高裁判所、法務長官府等よりミャンマー留学生を受け入れ、国際経済法、企業法、経済法、知的財産法分野の人材育成に貢献している。全学では、すでに 80 名を超える同窓生を輩出しており、2013 年 6 月には名古屋大学全学同窓会ミャンマー支部を設立した。同窓生は政府幹部や大学幹部として各方面で活躍している、参見：<https://cjl.law.nagoya-u.ac.jp/mmr/about/>。

② 日本貿易振興会海外調査部：『ミャンマーにおける地域経済協力の現状と課題』、東京：日本貿易振興会海外調査部、2001 年、第 45—55 頁。

③ アジア農村研究会編：『ビルマ広域調査報告書』、東京：アジア農村研究会、2005 年、第 5—10 頁。

緬甸关系的友好互动，比如刊登新年贺词、緬甸独立纪念仪式、緬甸各地的日语演讲比赛等活动，以此塑造日本在緬甸的正面形象，巩固两国之间的历史友好关系。此外，日本緬甸协会多次在发文中强调日緬合作的积极成果，如緬甸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等，日本希望在东南亚地区保持其影响力。^①

3. 学术自主性深化：批判性知识生产的制度化

首先，后殖民理论的本土化重构。根本敬的《抵抗与合作的夹缝：近代緬甸历史中的英国与日本》，突破“殖民—反殖”二元叙事，提出緬甸精英在英日统治下“策略性合作”理论，批判日本学界将緬甸简化为“被动受害者”的东方主义倾向。^②奥平龙二的《緬甸法制史研究导言》，解构“法律移植优越论”，指出緬甸传统法的弹性如何抵抗日本主导的司法改革，为本土法律人类学研究开辟路径。^③其次，是女性主义与底层史学的兴起。藤目由纪的《緬甸女性：军事政权下的生活与心声》，通过口述史方法，揭示军政府时期女性如何在佛教网络（如尼庵）中构建抵抗空间，挑战男性中心的“民主化叙事”。^④井野宪治的《緬甸女性地位》，批判日本援助项目（如 JICA 妇幼保健计划）忽视农村性别分工，呼吁将“性别预算”纳入对緬政策评估体系。^⑤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高桥昭雄在《緬甸体制转型与农村社会经济史：1986—2019 年》中提出緬甸农业政策的三大支柱为土地、流通价格和生产政策。^⑥书中详细分析了转型过程中緬甸农村的脱农化现象具有较强的东南亚特征。之后作者通过与泰国东北部的脱农化相比较，认为緬甸脱农化现象较晚显现，作者还以緬甸 T 村为例展示了 2000 年初緬甸农村变化的加剧，特别是在军政后期该特征较为突

① ミャンマーフォーカスバックナンバーⅠ、日本ミャンマー協会、JAPAN MYANMAR ASSOCIATION、http://www.japanmyanmar.or.jp/myanmar_focus.html。

② 根本敬：『抵抗と協力のはざま：近代ビルマ史のなかのイギリスと日本』、岩波書店、2010 年、第 43—47 頁。

③ 奥平龍二：『ビルマ法制史研究入門：伝統法の歴史的役割』、近代文芸社、2002 年、第 5 頁。

④ 藤目ゆきタナッカーの会編、南田みどり監訳：『アジア現代女性史Ⅳ 女たちのビルマ—軍事政権下を生きるビルマの女たちの声』、明石書店、2007 年、第 150—175 頁。

⑤ Ni Ni Myint 著、井野憲治訳：『ミャンマーにおける女性の地位』、北九州：アジア女性交流・研究フォーラム、2003 年、第 80—100 頁。

⑥ 高橋昭雄：『ミャンマーの体制転換と農村の社会経済史：1986-2019 年』、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21 年、第 170—185 頁。

出。研究还揭示了“缅甸村庄内部的非农化普遍性”是脱农化初期的稳定性特征，尽管该时期农业比重逐渐下降，但是农业依旧是缅甸的关键支柱产业。作者利用“区域比较的视角”将缅甸的脱农化现象与泰国东北部进行比较，这有助于日本更全面地理解缅甸在东南亚区域中的经济发展位置和特点。其他方面，高松香奈从“安全保障与人口迁徙”的视角，明确了日本当代对缅甸援助的核心方向，并指出防止人口贩卖及保护女性受害者是确保援助和平实施的关键。^①

综上，进入 21 世纪之后，日本学界对缅甸的研究呈现了从冷战时期的“旧标准”演变为如今的“新数据”。同时，许多学者在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中进一步呈现出批判与妥协的特性。例如，根本敬等提出“本土化理论”试图推动本国地区研究框架，但从整体来看，这些“官方学者”仍受到“印太战略”等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完全脱离国家利益至上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这种微小的突破表明日本的“新世纪学界”虽然在方法和视角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学术话语权的结构性障碍依然存在。

（二）方法论演进：21 世纪的技术推动与批判性转向

在 21 世纪，日本对缅甸的研究方法有两大特征，首先是“数字技术渗透”，其次是“批判性学科融合”。从当时的情况看，一方面这种研究方法的形成受到全球学术范式转变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与日本“印太战略”下知识权力的重构密切相关。

1. 数字化技术与田野调查的结合

首先，进入 21 世纪以来，相比二战和冷战时期的田野调查，日本学者重新采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缅甸。比如，米原慎、川崎昭如等学者较早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分析缅甸土地利用变化对洪水泛滥的影响，具体评估了缅甸巴哥河流域的洪水风险。该研究借助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模型构建器（ArcGIS）、分布式水文模型

^① 高松香奈：『政府開発援助政策と人間の安全保障』、東京：日本評論社、2011 年 12 月、第 125—191 頁。

(HEC-HMS)等技术手段展开分析,旨在评估不同土地利用模式下洪水的影响。结果显示,缅甸森林覆盖的增减对洪水风险具有显著影响,并强调了森林管理在洪水防控中的关键作用。此外,研究还提出了土地利用规制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应对策略。工藤年博通过分析标记出企业发展的生态敏感区,结合卫星图像分析军方布防动态,为日本企业规避政治风险提供决策支持。此类技术工具将传统田野调查升级为“空间—权力”可视化分析。^①日本利用这些研究结果,加强与缅甸在灾害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②其次,民生数据的资本化利用。江部佑辅通过“缅甸医疗数据库”收集基层医疗机构数据,表面用于公共卫生政策建议,实则通过论证“医疗救援不可替代性”为日本政府维持并强化对缅甸(OOA)提供理论依据,暴露“学术公益到商业利益”的共生逻辑。^③

2. 跨学科方法的批判性融合:解构权力叙事的理论工具

首先,后殖民理论与法律人类学的交叉。比如根本敬引入策略行动理论,分析缅甸精英在英日统治下如何利用“表面合作”换取资源,重构“抵抗的日常化”叙事,挑战“英雄主义独立史观”。其次,女性主义与底层史学的突破。藤目由纪的《缅甸女性:军事政权下的生活与心声》,采用口述史与参与式观察,记录农村女性通过佛教网络(如供养僧侣)构建非正式权力空间,颠覆男性中心的民主化叙事。井野宪治的《缅甸女性地位》,结合性别预算分析与发展经济学,批判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妇幼保健项目忽视乡村性别分工,提出“护理经济”视角下的援助改革方案。

从方法论局限上分析,首先技术霸权与数字化监控的伦理困境。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民生大数据”未经充分伦理审查,导致缅甸公民隐私数据流向日本企业。其次理论工具的单向输出日本学界将“印太民主化”框架强加于缅甸研究(比如中西嘉宏的军政分析),忽视

① 工藤年博:「ミャンマー停滞する中央、成長する国境地域」、『アジア研ワールド・トレンド』、2006年、第16—19頁。

② 米原慎、川崎昭如:「将来の土地利用変化が洪水氾濫域に及ぼす影響の評価:ミャンマー・バグー川流域におけるケーススタディ」、一般社団法人、『地理情報システム学会GIS—理論と応用』、2017年6月、第25号第1期、第22—32頁。

③ 江部佑輔、下条文武:「ミャンマーの医療事情」、『新潟医学会雑誌』、2005年第119号第2期、第106—116頁。

缅甸本土学者提出的“佛教民主主义”等替代性理论，暴露方法论中的“认知霸权”^①。微观叙事的碎片化：尽管口述史与田野调查深化，但对缅甸底层社会（如流动劳工、少数民族群体）的交叉性研究仍不足，难以全面反映社会复杂性。

（三）知识权力批判：日本缅甸研究的意识形态张力与学术自主性反思

21 世纪，日本对缅甸的研究在理论深度和方法论创新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知识生产始终与日本国家利益、区域战略以及全球权力结构紧密交织。这种“知识—权力”的共生关系既推动了研究深化，也暴露了学术自主性缺失、西方中心主义残余和缅甸主体性遮蔽等核心问题。

1. 知识生产的国家利益导向：学术与政策的隐性契约

日本国有机构（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外务省直属研究所）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政策服务特征。财务省关于缅甸金融市场的研究报告直接指向“理解东南亚经济共同体地位”，其结论隐含日本如何通过金融合作扩大区域影响力的政策建议；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的缅甸—柬埔寨比较研究，本质是为日本选择东南亚战略支点提供学理依据。这种“问题意识”的设定，使得研究焦点天然偏向缅甸的政权稳定性、资源开发潜力、地缘战略价值等议题，而忽略缅甸底层社会的文化韧性、地方性知识体系和非正式经济网络。比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发展援助项目以“数据收集—政策建议”为链条，其研究成果往往服务于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效率评估，而非缅甸本土发展需求。例如，对缅甸基础设施的研究集中于港口、铁路和经济特区等有利于日本企业参与的项目，却较少关注缅甸微型水利系统或传统社区治理模式。这种研究导向实质是将学术转化为“软实力工具”，

^① 中西嘉宏：「ビルマ式社会主義と軍内政治」、『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2006 年第 35 期、第 22—55 頁。

强化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存在。

2. 理论框架的西方中心主义残余：后殖民语境下的学术依附

尽管日本学者引入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西方霸权，但其分析范式仍深陷“西方或者非西方”二元对立框架。例如，奥平龙二对缅甸传统法律的研究，强调缅甸缺乏“代议制传统”，将英国殖民议会制度视为“民意表达的合理化尝试”，隐含“现代性等于西方制度”的价值预设。类似的，根本敬对缅甸独立运动中“抵抗与合作”二元论的解构，虽试图突破传统叙事，但其理论工具（如国家主义、精英策略分析）仍源自欧洲政治哲学传统，未能充分吸纳缅甸本土的佛教政治伦理或“阿纳得”（Anade，缅甸语中基于互惠的地方治理传统）等概念。从深层矛盾上看，日本学界对缅甸的“理论翻译”存在双重性：一方面批判西方殖民遗产，另一方面又将缅甸的研究经验纳入西方社会科学解释体系。

（四）批判性知识生产转型：国家战略影响与学术自主重建

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本学界成功探索出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的结合路径，同时兼顾了一定的学术独立性和批判性。此外，国家政策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平衡成为 21 世纪日本学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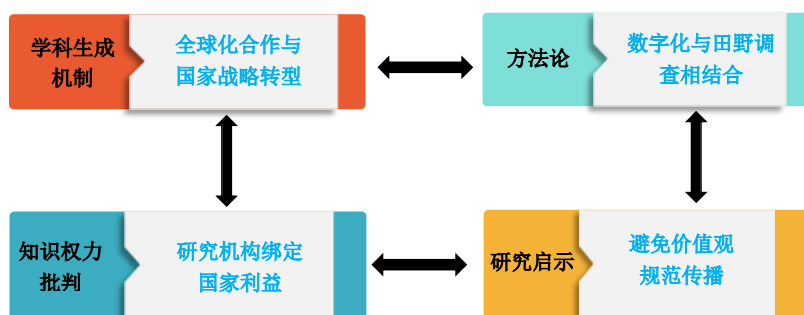


图4 冷战初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政策实践互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 4 所示，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本学界成功探索出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的结合路径，同时兼顾了一定的学术独立性和批判性。该时期日本对缅甸研究的学科生成机制呈现出“全球化合作与国家战略转型”的特征，与之前相比，此时的日本更加关注缅甸的方方面面，从冷战时期的经济赔偿与合作，再到 21 世纪的深化研究，都体现了日本学界将国家利益与地区研究绑定的事实。比如，该时期日本学者通过研究缅甸的民主、人权、自由经济等价值观念，此举是为了在当地塑造正确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缅甸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数字化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上，从灾害预防到地形勘探都有日本学者的身影。此外，部分学者主要聚焦于“缅甸女性权力”“缅甸农村发展”“公共卫生”等民生领域，致力于解决缅甸民众的实际生活问题。这表明在日本对缅甸的援助中，关注民生需求、改善人民生活是构建友好关系和促进发展的关键切入点。但是，深度的与国家利益绑定的地区研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价值观的传播。因此，21 世纪的日本研究者需保持理性和客观。同时，应警惕潜在的价值观影响，以确保研究的公正性和建设性，避免单纯为国家利益服务，忽视了研究的客观性和道德责任。

五、研究视角的演变与启示： 日本对缅甸研究的深入探索

“缅甸研究”作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典型案例，总共经历了四次研究范式转变：从殖民时期的“文化刺刀”、冷战初期的“知识盾牌”、冷战中后期的“学术透镜”，到21世纪的“批判性创新”。通过研究日本学界对缅甸研究的历史文献、文化成果等多重互证，可以揭示日本学界在殖民遗产清理、冷战知识解构、全球化反思及学术伦理重构四重维度下的认知跃迁。

（一）二战时期的“战时实用主义”

二战期间，军事占领和殖民扩张需求推动日本对缅甸展开研究，不仅研究内容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而且研究主体也以政府机构为主，如陆军省、满铁调查部、外务省通商局、商工省贸易局等，研究集中在缅甸的战略资源、地缘政治价值以及殖民管理等领域，该时期的研究为日本的殖民政策和统治提供直接政策支持。然而，这种“殖民地区”研究学术上表现力不足，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学术深度。

（二）冷战初期的“学术理论转型”

冷战初期，日本学界对缅甸的研究逐渐摆脱战时的实用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逐步转向“初级”学术化和“单一”理论化。对缅甸整体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框架更加多样化，研究领域从单一的资源开发拓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同时，学术交流的便利性使得研究成果能够更快地传播与共享，推动了日本对缅甸研究的深化。

（三）冷战中后期的“跨学科交融与深化”

冷战中后期，日本学界对缅甸的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实证研究与田野调查趋势明显，且从历史研究转向现实政策评估等特点。研究关注经济转型与援助政策、社会结构与文化、历史与政治等方面。创新性体现在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深化，但也存在政策导向的学术局限、地域研究局限和理论框架单一等问题。此外，研究成果形式上期刊论文数量超过书籍，研究主体分工各有侧重，研究内容也存在差异。

（四）21 世纪以来：战略政策实践的持续深化

21 世纪以来，日本学界融合多学科视角，拓宽了对缅甸社会和历史的理解。首先，该时期对缅甸的研究更具跨学科与多主体合作的特点。研究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等。其次，“新世纪”的日本学者将微观实证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深入探讨缅甸的民族问题和社会动态。研究关注点包括政治史、民族冲突、农业与资源开发、社会文化等方面。但是该时期的学界也存在政策导向性强、忽视缅甸内部复杂性等局限性。

（五）启示与借鉴

地区研究既复杂又单一，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研究能够看出该国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方法。首先，日本学者在缅甸研究中广泛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全面解析缅甸的社会结构、政治环境及经济发展。其次，日本对缅甸任何研究阶段都擅长利用实证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这使得研究具有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可靠性。最后，日本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将国际化与区域化相结合，并且能够关

注缅甸自身的历史发展，还将其置于东南亚乃至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中进行分析。

六、总结

日本学界对缅甸的区域国别研究历经百年演变，从明治时期的初步探索到二战时期的殖民扩张，从冷战初期地缘战略分析的范式转型到冷战中后期的多学科交叉与批判性深化，最终在 21 世纪形成全球化协作与技术驱动的复合研究体系。对缅甸研究始终与日本国家战略深度绑定：二战时期以军事地理学与历史重构服务资源掠夺；冷战初期通过实证研究与政策闭环将经济援助包装为“发展主义”；冷战中后期以技术霸权与文化殖民巩固隐性霸权；21 世纪则依托数字化工具与批判理论构建“学术—政策—资本”全球网络，但技术伦理困境与认知霸权仍暴露知识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一历程揭示区域国别研究的双重性：既为国家利益提供学理支持，又因工具化风险面临学术伦理危机。其启示在于，需通过伦理重构、方法论创新及权力制衡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桎梏，推动公平的知识生产机制。未来研究应聚焦微观史交叉性、技术数据主权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比较研究，在坚守学术独立与批判自觉中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与学科解放。

[责任编辑：李丽]